

中、俄对外蒙电报权的争夺：技术与帝国主义案例研究

董杰¹，顾永杰²

(1. 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2.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摘要：晚清至民国初年，中俄为争夺外蒙电报进行了多次交锋。中国在争夺过程中表现的十分尽力，然而俄国一旦以主权相要挟，中国只得就范。俄国在外蒙以电报进行技术侵略，表现出掩饰性、两面性与妥协性的帝国主义技术侵略特征。

关键词：外蒙；有线电报；技术侵略；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51; U285.1 **文献标识码：** A

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清代乾隆年间便设有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分区管辖，经略外蒙。外蒙古地处蒙古高原北部，幅员辽阔，东与黑龙江将军辖地毗邻，西与新疆相连，向南是内蒙古地区，北与俄国接壤，对中俄两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沙俄对这片本属中国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 17 世纪 40 年代，俄国在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转而把侵略的重点放在亚洲的中国一面，积极向外蒙地区进行势力扩张，不断蚕食我国喀尔喀领土。后经康熙、雍正两朝政府坚决抵抗，中俄两方前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两国关系回暖，沙俄侵略野心暂得遏制。^[1]有鉴于此，清政府视外蒙古为边疆重地，康熙时代就在这里建立了完善的台站系统，便于各种信息的上下传递，以资军情。

晚清政府内忧外患，为维持其统治，开展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下，有线电报技术引进中国，近代电讯事业在古老的大地上迅速发展，逐渐取代落后的台站系统。到 19 世纪末，全国各重要城市均有电报相连，以通消息。在短短十余年间，中国有线电报架设“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 22 行省，并及朝鲜外藩。”^[2]鉴于外蒙古地位之重要，1896 年清政府令邮传部在库伦设立邮电局，架设有线电报。1897-1899 年间，逐渐建立起自北京起，沿途经张家口、滂江、叨林、库伦、恰克图，全长 2194 公里的有线电报线。有线电报也许是外蒙仅有的近代科技文明。^[3]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三地电报相通，极大的方便了内地与外蒙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信息的交流，同时也利于中、俄贸易的增长以及旅蒙商在外蒙的商业活动。1907 年 11 月，邮传部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向用传骑通递文件，殊形不便”，决定在此新设电报线，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外蒙勘测线路。^[4]

清政府加强对外蒙控制的同时，沙俄政府也加紧了侵略的步伐。中俄两方就外蒙电报控制权进行了数次针锋相对的斗争。关于这场涉及电报权争夺的过程，除刘国俊在其学位论文《1914 年——1915 年恰克图谈判与〈中俄蒙协约〉》^[5]中有简单叙述外，学界鲜有提及。本文串通史料，期望将中俄争夺外蒙电报线的过程做一清晰叙述，并将其作为技术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一、沙俄占据外蒙电报局

早在 1862 年，俄国公使把留捷克就向清政府提出照会，希望将俄国东方电线由西伯利亚经恰克图和北京架设到天津。^[6]此项提议名为发展中俄贸易，实则将外蒙通讯纳入俄国东方电线系统，加速沙俄对外蒙的控制。但是清政府最终没有答应此项请求，沙俄阴谋破产。19 世纪末，清政府在

内地与外蒙之间建立起自己的有线电报网，由于当时清政府仍然实际掌握外蒙的统治权，俄国政府不敢明目张胆的侵占外蒙电报，于是以参与维修电报线为借口，妄图插手外蒙电报事业。

宣统元年（1909）正月初九，外务部向邮传部发函，称俄国要求派技师修理北京至恰克图电线，“今春之修理，及将来之零修，必须拣派熟谙电政之欧工师，始能实有利益”。中方对俄方这种无理要求给予坚决拒绝。十五日，邮传部答复称：“派员修理电线，或用华工师，或用洋工师，均系中国自有之特权，此次修理张家口至恰克图电线，前据上海电政局察请，委派熟谙电政工程之华员杨桂清等承办，业经本部批准在案，俄使所商指定拣派欧工师一节，碍难照准。至电局雇用电工各工程师，或查勘线路，或办理工程，均由电政局随时察准，拣选调派，或用华员，或用洋员，均使各该工程师，各尽其相当之职任，本部只视其适用与否，本无华洋员之分，张恰电线，是否通畅，责在电局，可以过问，至用人一节，俄使未便干预，以重主权，而清界限。”十九日，外务部回复俄使：“修理京恰线派欧籍工程师碍难照允。”^[7]沙俄阴谋又未得逞。

鉴于沙俄政府侵占我西北、东北、外蒙之心日盛，为了及时、准确的掌握北部边疆动态，邮传部“议决即日选派熟悉邮政人员赴新疆、蒙古等处添设邮局”，同时“又拟在边省及蒙藏等处，开设邮政学堂，招收生徒，教以邮政各事”^[8]，积极培养熟悉电报技术的中国人员，避免外人插手我邮电事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局动乱，外蒙各王、公、扎萨克、喇嘛等趁乱推举哲布尊丹巴为帝，宣布独立。蒙兵驱赶驻扎在外蒙的中方官吏、接手中方产业，其中就包括邮电局。

暴乱之初，库伦电报局官员与蒙兵交涉，称交通机关并非行政机关，请求保护，蒙兵应允。电报照常通报，虽然有蒙兵监视，但外蒙消息仍可以及时传递给中央政府。后内地报纸登载外蒙消息，宣称接收到库伦密电，外蒙政府方知电报之事重大，决定强占电报局。1911年11月17日中午，俄国官员带领外蒙士兵冲入电报局，称奉蒙古政府命令，接手电报局一切事务，俄人“以保存电报线为先”，控制库伦电报局。恰克图电报局，也在19日被蒙俄官兵接收。^[9]

二、沙俄获取外蒙电报线路架设权

沙俄一方面掌控外蒙现有电报线路，另一方面则希望独享在外蒙新建电报线路的权利，以便掌控外蒙通讯系统。外蒙宣布独立之后，积极向俄国寻求政治、军事，尤其是经济上的支持。俄国的援助自然不是无偿的，在发展外蒙经济的幌子下，俄国抛出了铁路条约和电报条约，美其名曰增加外蒙经济收入，促进当地科技水平的发展，实际上是将外蒙的交通、通讯命脉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满足自己经济利益与殖民统治的需要。

电报条约主要内容是由俄国提供贷款，架设孟达至乌里雅苏台间的电报线。1914年3月14日，外蒙内阁对这条电报条约进行讨论之后，做出了请求俄国政府改变电报线路，架设从科什阿加奇到科布多，再到乌里雅苏台，最后延至库伦的电报线的决定。俄国驻外蒙外交代表密勒尔对这项决定十分不满。俄蒙双方就电报线的架设进行了多次协商，密勒尔对外蒙总理大臣三音诺彦汗软硬兼施，而后者也破费心机的与之周旋。

密勒尔首先劝说三音诺彦汗，称架设孟达至乌里雅苏台之间的电报线需时不多，而且一旦投入使用，蒙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电报与地方当局建立联系，同时俄蒙之间的贸易也因为有了电报而快速发展，这使得电报收益十分可观，蒙古政府在维护统治、增加收入上都因这条电报线的架设而得利。所以说，无论从技术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不应该改变这条电报线路。密勒尔在向三音诺彦汗描述架设这条电报线美好前景的同时，威胁他说，外蒙内阁的决定将会给俄国政府留下不良印象，而且会影响其它协议的签署。^[10]

然而密勒尔的理由没有说服外蒙高官。三音诺彦汗及杭达亲王口头上允诺重新修改蒙古内阁对架设孟达——乌里雅苏台电线让与权，然而在递交给密勒尔的外交照会中依然拒绝俄国的要求，同时表达蒙古对俄国坚贞不渝的友谊。这使得密勒尔十分恼火，他强调蒙古政府应当用实际行动而不

是语言来表示所谓的友谊，甚至用警告的语气称蒙古政府的这种做法是对俄国的敌视方针，这可能会给新政府带来不愉快的后果。[11]

另一方面，外蒙内阁的坚决态度，也使密勒尔感觉只凭空洞的美好前景是达不到帝国目的，实实在在的援助才是重要的。他将拨付给外蒙政府急需的武器、贷款等巨大帮助与铁路条约、电线条约放在一起，与外蒙政府进行谈判，如此一来，他深信对方没有理由避而不签孟达至乌里雅苏台电线架设条约。[12]俄国政府对密勒尔的想法大力支持。俄国政府接受了密勒尔的贷款方案，同时陆军部也同意拨付外蒙武器，因此，俄方“有理由期望蒙古政府珍视给予它的巨大帮助，并按所期望之意思解决铁道条约及电线条约问题。”[13]果不出密勒尔所料，在巨大援助的诱惑下，外蒙政府就贷款、武器事宜与俄国代表进行讨价还价的同时，不得不重新考虑签署电线条约了。

8月1日，外蒙政府接受了电报条约，但是“因对铁道条约最后一条固执己见，使新贷款合同及架设孟达——乌里雅苏台电线合同之签署受阻。”[14]不过这种“固执己见”在金钱、武器的诱惑面前不会长时间存在，外蒙政府最终于9月30日同俄国专使密勒尔签署了“帝国政府对措辞业表赞同的四个条约”，即铁路条约、电报条约、三百万合同贷款条约和购买武器合同。[15]

电报协议的实质是外蒙以电报权换取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支持。外蒙得到了他们需要的武器、贷款以及俄国政治上的支持，而俄国掌握了外蒙的通讯系统，这将成为沙俄进一步控制外蒙的基础。然而，俄蒙双方协议却损害了中国政府在外蒙的主权，中方代表在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上就维护中国政府在外蒙的主权与俄、蒙代表进行激烈的斗争。

三、中俄两国争夺外蒙电报权

1914年9月8日，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召开。俄蒙绕开三方会谈签订电报协议的举动令中国政府十分不满。中方代表在协约草案的第二十二条中明确提出，外蒙的铁路电线邮政，应由中央政府办理，并在11月26日第十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铁路、邮电权涉及国防安全，不应当列入外蒙自治权范围内，并举法国在安南有邮政为例，证明铁路、邮电为宗主权的一部分，要求由中央政府办理外蒙的铁路、电报、邮政事务。外蒙专使坚持认为邮电属于商务，而中俄声明承认外蒙有整理工商事务权，所以认定管理邮电是其自治权之一，但是，出于表示与中国政府亲睦之意，中国在外蒙已经架设的恰克图、库伦、张家口之间的电报线由中国继续经营。俄国专使亦表示外蒙有自行管理邮电的权利。[16]中蒙争论的关键在邮电权是否属于外蒙自治范围，所以在第十八次会议上，俄国专使提议暂时先将铁路邮电问题不列入外蒙自治权范围之内，中、蒙两方均无异议，但随后的谈判在铁路、邮电权上又起冲突。于是在12月3日第十九次会议上三方首先讨论邮政问题。

会议之初，中国专使认为俄国在外蒙有权设立邮电局，中国也应当具有同种权利。俄、蒙专使辩称此项权利是指私人自办邮政。中国专使驳斥称，私人尚有办理邮电的权利，中国作为外蒙宗主权，更应该有设立邮政的权力，随即宣称中国政府有权在外蒙境内设立自己的邮政，外蒙政府也可以自己设立邮政局，但不将后者写入协议。但外蒙专使仍然坚称邮政权属于外蒙自治权范围。双方意见迥异，邮电问题只得延至下次会议讨论。

此时中国代表在外蒙邮电权上的谈判有理有据，已占主动。当天密勒尔就将中方以及俄蒙两方对于外蒙邮电权归属问题的主张向俄国政府进行了汇报，又于8日就中方在邮电问题上的“不妥协论点”向外交部寻求指示。[17]当天俄国外交部回复密勒尔，授意他在会议上发表声明，称三方会议上俄国专使无权讨论邮电问题。于是10日第二十次会议一开始，密勒尔便以自己无全权讨论外蒙铁路、邮电问题为借口，阻挠三方关于外蒙邮电权的谈判。中方代表立即驳斥，称上述问题在会上已经讨论多次，况且各方都提有条文，铁路、邮电是否划归外蒙内政，应该在会议上解决。两方相持不下，不欢而散。

当晚，陈篆便电告外交部，“邮电条文讨论已有头绪，俄使遽行取消，迹近有意破坏。……似此外蒙权利（铁路邮电权），俄已垄断殆尽，如必迁就了事，只有讨论虚文，不如暂行停议，另择地点，

再图补救。”15日，外交部回电：“铁路邮政问题，若会议难得要领，只有另备照会声明彼此不相干涉，便可续议他款，免得进行。”陈箴随即与密勒尔进行磋商，仍无进展。21日陈箴实不得已，只得按照外交部的指令互换照会，但密勒尔依然坚持他无权办理，需要请示俄方政府再做定夺。^[18]三方会议关于电报问题的谈判暂时搁置。

1915年4月3日，俄国外交大臣给密勒尔拟定了新的电线条款：“因恰克图库伦张家口电线之一段，经过自治外蒙古境内，故应作为自治外蒙官府完全之产业。关于在内外蒙交界处得设立中蒙派员管理之转电局，递电收费章程及电线占有者分配进款等问题，由各方代表所组织之特别专门委员会商定。”^[19]8日，四十三次会议讨论诉讼条文时，密勒尔突然提出要求先行讨论外蒙电报问题，中国专使顿感突然，严词拒绝，不允许讨论。11日，密勒尔与陈箴会面，极力要求先商定电报条文，并以“变更前议”相要挟。在随后的第四十四、四十五次会议上，密勒尔依然要求先议电报条文，并在16日的第四十六次会议上将电报条文与诉讼、邮政、台站相关联，宣称如果电报条文如不能使俄方满意，其他关条文“未必允准”。^[20]

中方代表后数次力争，但密勒尔并不让步，屡屡以变更已签订之条款相威胁，陈箴等人虽感“气愤填胸”，却无计可施。更有甚者，5月15日晚，密勒尔送来照会，将原议的邮政、台站两条变更，16日早，蒙古官兵又将恰克图中国邮电局查封。中方代表无奈之下，只好完全接受俄方电报条约。28日下午，在第四十八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二十二条《中俄蒙协议》，并在互换的照会中，要求中国政府在《中俄蒙协议》签署后六个月内，将张家口、库伦、恰克图间电报线在外蒙范围内的一段划归外蒙古官员管理，而中蒙电线连接点，则由中俄蒙电报专门委员会裁定。

四、中国电报员入外蒙电报局工作

恰克图会议结束，外蒙地位得以确定，中国名义上依然是外蒙宗主国，民国政府随即任命陈箴为驻库伦办事大员，负责外蒙各项事宜。1915年11月18日至1916年1月24日，电报三方会议在俄总领事官邸内进行，中国代表为郭世铎、恒宁生，俄国派内务部邮电股股长塞尔格参加会议，外蒙则派内务衙门副长达尔汗亲王绷楚克车林为委员长，财务衙门参赞多勒嘎台公成德诚勋、镇国公朝克图瓦其尔为会议委员。^[21]会议本身已对中国掌握外蒙电报帮助甚微，陈箴将工作重点转向外蒙外交长辅国公车林多尔济，希望通过他，积极促成外蒙电报局聘用中国电报员工作，如此中国政府可以时刻获得外蒙重要消息，扭转目前不利处境，重新控制外蒙通讯。

12月27日下午车林拜访陈箴，陈箴借机与之商量将来外蒙各电局聘用华员工作一事。陈箴认为外蒙电报局原来的华员已经熟悉外蒙电报业务，如果继续留在外蒙工作，“于外蒙利益甚多”。车林大以为然。1916年2月12日下午三钟，陈箴前往车林府邸，建议留用乌得、叨林两电局工作人员，计局长二人，电报员五人，薪水等一切照旧。车林答应与外蒙政府协商。考虑到俄方一定会抵制留用华员，20日下午，陈箴又前往车林处，建议由中方电报员自行与外蒙官府订立合同，如此一来，中国电报员入外蒙电报局工作只是私人行为，与中国政府无关，不与恰克图协约相抵触，俄国自无话可说。^[22]车林甚表同意。

在种种好处面前，外蒙官府全体赞成留用七名中国电报员在外蒙电报局供事，陈箴致电交通部，请派代表来库伦签订外蒙电报局聘请中国电报员在乌得、叨林及库伦电报局工作的合同。

俄国岂会对中方的行为熟视无睹，29日，俄总领事密勒尔给陈箴送去紧急照会，请求双方暂缓签订合同，等密勒尔与陈箴会商后再办。当下密勒尔就将此事向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汇报，称聘请中国官员为蒙古服务违背恰克图条约，并请求沙查诺夫通过中国政府对陈箴施加压力。俄国政府经过会商后认为根据恰克图条约，中俄两国不得干涉外蒙内政，如果禁止外蒙政府聘请中国人工作，那么中国也会要求俄国召回在外蒙供职的俄国人，如此一来不符合俄国利益的。但是，聘请中国人工作也会损害俄国利益。在两难的情形下，沙查诺夫别无他法，只好给密勒尔回电，指示他通过威逼利诱外蒙官员聘用俄国电报员。^[23]

得到外交部的指示，密勒尔当天就拜访陈箴，称外蒙电局聘用华员是中方干涉外蒙内政的行为，俄方提出抗议，并请取消合同。陈箴回答这是外蒙官府与电员个人订立合同，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而外蒙聘用工作人员，是外蒙的内政，中俄两国按约均不应干涉。密勒尔无言以辩，只得故伎重演，转而威逼利诱外蒙官员，这招果然奏效，3日下午，车林拜会陈箴，称：“聘用电员事，俄领破坏甚力，外蒙为调停感情起见，拟聘用中国电员四人，俄国电员二人，以免两方争执，并乞原谅苦衷。”陈箴心知此事不可强求，况且外蒙电报局中国电员比俄国电员多，尚能掌控外蒙通讯，心愿已足。

五、对中俄争夺外蒙电报的评析

中俄两国争夺外蒙电报权的实质，是中、俄两国争夺外蒙控制权，将其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较量，这可以看成技术与帝国主义的一个案例进行研究。然而，俄国与外蒙并非简单的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再加上外蒙原有宗主国①——中国的参与，所以在争夺过程中又体现出与殖民地科学技术相区别的特征。^[24]我们将从中国和俄国两方面就技术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进行评述。

（一）中国——“尽力而为”争取权利

作为原有宗主国，中国自然不会将本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拱手让与外人，虽然晚清政府、北京政府都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势中，但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基本政治前提下，势必与俄国力争外蒙控制权。但是，由于自身政治、军事力量的衰弱，这种争夺只能表现为“尽力而为”。

俄、蒙官兵接收外蒙电报局后，中方积极安排部分电报员留任外蒙电报局，将外蒙军政情报及时通知中央政府。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库伦，都是公开的秘密。俄国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致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的电报中提到：“关于库伦所发生之一切，看来中国政府经常得到库伦电报局长之情报，他是中国间谍。”^[25]俄国对蒙谈判全权代表廓索维慈抵达库伦，与蒙古众王公就俄蒙协议和商务专条的签订进行协商，商谈结束时，廓索维慈提请众王公严守秘密，但是他自己知道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库伦政府之一切打算及决定，甚至呼图克图宫中发生之事会立刻为人们所知晓。当然，中国电报局长会将其报告北京。”^[26]另一方面，陆徵祥曾向俄国驻华公使库朋斯齐提出希望中国电报员返回蒙古电报局工作，^[27]其目的是进一步增加情报的来源。

而后恰克图会议上，中方代表据理力争，已经在电报权问题上占据主动，俄国专使无理取消议条文，中国政府顾全大局，陈箴亦忍辱商谈，但毫无进展，只得发表照会，坚持对外蒙铁路、电线、邮政的所有。但俄方拒不让步，每每以“变更前议”相要挟，北京政府不得已，在“舍实求名”的谈判原则下②，只得放弃税则、铁路、邮电等“实利”换回中方在外蒙的“宗主权”。虽然采取“舍实求名”的策略，致使中方在外蒙的权益受损，但却迫使外蒙取消独立，为1919年完全恢复外蒙主权创造条件。谈判之后，中方更是积极筹划安排七名中国电报员进入外蒙电报局工作，实际掌控外蒙通讯系统，虽有俄方阻挠，但最终还是有四名中国电报员留任，是俄方电报员的两倍。同时，陈箴利用此事促使外蒙政府答应哲布尊丹巴接受中国政府册封，这在国际法上意味着中国对外蒙主权、领土的所有，从法理上证明了外蒙从属中国，并非独立国家。

（二）俄国——技术侵略的掩饰性、两面性和妥协性

俄国政府策动、支持外蒙摆脱中国政府，转向投靠自己，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之中，显然不能毫不掩饰对其进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所以俄国在外蒙以交通、通讯技术为侵略手段的一切侵略活动，都会显示出与殖民地不一样的特征。

首先是技术侵略的掩饰性。俄国并没有直接出兵抢占外蒙电报局，而是借助外蒙官兵控制外蒙已有电报线路，并在“促进当地科技、经济发展”的幌子下，进一步控制外蒙交通、通讯系统，这就是其侵略的掩饰性。

密勒尔劝说外蒙政府架设孟达至乌里雅苏台间电报线，表面上宣称这条电报线一旦投入使用，

蒙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电报与地方当局建立联系，同时俄蒙之间的贸易也因为有了电报而快速发展，这使得电报收益十分可观，如此一来蒙古政府在维护统治、增加收入上都因这条电报线的架设而得利。实际上，在他给俄国外交大臣的电文中，却明明白白的写着“俄国政府之目的似乎也不让蒙古发展经济”。^[28]原因很简单，只要外蒙经济依靠俄国，那么它将永远处于后者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外蒙最重要的三个城市是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只有掌握了这三个地方，才算完全控制外蒙，孟达——乌里雅苏台是纵线，并没有将这三个城市连接在一起，而外蒙政府提出的科什阿加奇——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电报线是横线，正好将这几个主要的城市贯穿，这就是三音诺彦汗等人为什么改变电报条约的原因。由此可见其掩饰性之一斑。

其次是帝国主义为达目的而表现出两面性——利诱与威胁并存。由于俄国不能直接对外蒙实行殖民统治，所以为了达到统治目的，不得不需要采取“萝卜加大棒”式的侵略模式。密勒尔与外蒙政府商讨签订电报条约的过程中，面对三音诺彦汗等大臣的虚与委蛇，密勒尔一方面以提供资金、军事援助做引诱，一方面不断抛出拒签是敌视俄国的做法，将破坏俄蒙两方关系的言论相威胁，甚至威胁说直接与中国进行谈判。这种两面性同样表现在外蒙电报局聘任中国电报员的事情上。

此外，帝国主义还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三音诺彦汗在向俄国政府借款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私人银行或个人寻求金钱上的帮助。这使得密勒尔不得不建议俄国政府重新考虑对电报条约内容进行修改，在签署架设孟达——乌里雅苏台电报条约的前提下，从国库中再拿出1万卢布用于帮助外蒙政府架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电线。^[29]虽然最终结果如俄所愿，但帝国主义所表现出的妥协性还是存在的。

中俄争夺外蒙电报权这一案例，体现出外蒙原有宗主国中国与后来帝国主义国家俄国所表现出的符合各自政治地位的不同特点，这也是技术与帝国主义研究中的特有现象。

注释

①在中俄《声明》文件以及恰克图谈判中，中国宣称对外蒙拥有宗主权，北京政府认为“所谓宗主权者，即一国之内，某处地方之完全主权，受有一定限制而已”，这与殖民国家对殖民地自称宗主国含义不同。

②“舍实求名”是指在对外主权争端中，在争取事实上的管辖权无望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治权即所谓的“实利”而争取主权即所谓的“名分”，然后再等待时机逐步争回治权的外交策略。详细论述可参见张启雄. 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287

参考文献

- [1] 孙喆, 王江. 对 1689—1727 年中俄外交关系的考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J]. 2 (1). 97-148.
- [2] 李鸿章. 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 [A]. 中国史学会编. 洋务运动 [C]. 第六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446.
- [3] 樊明方. 清末外蒙新政述评 [J]. 西域研究. 2005 (1). 36.
- [4] 邮部之交通政策 [N]. 中国日报. 1907-12-9. (5).
- [5] 刘国俊. 1914 年—1915 年恰克图谈判与《中俄蒙协约》 [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6] 张国辉.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231.
- [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海防档·丁·电线 [M], 第 4-7 册.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57. 2837—2839.
- [8] 专电. 民立报. 1911-8-7. (2).
- [9] 俄、蒙官兵占据库伦、买卖城电报局案 [M]. 吕一燃编.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12-15.

- [10] 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A]. 1914年3月20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287-288.
- [11] 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A]. 1914年3月31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297.
- [12] 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A]. 1914年5月13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314-315.
- [13] 外交部一等参事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A]. 1914年6月15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325.
- [14] 驻蒙古外交代表兼总领事致外交大臣函[A]. 1914年8月1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363.
- [15] 密勒尔9月30日第50号电报[A].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373.
- [16] 中俄蒙三方恰克图会议录[A]. 吕一燃编.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76-80.
- [17] 密勒尔12月3日第207号电报、12月8日第224号电报[A].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373.
- [18] 陈策. 止室笔记第一种. 恰克图议约日记[A]. 吕一燃编.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166.
- [19] 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A]. 1915年4月3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394-395.
- [20] 陈策. 止室笔记第一种. 恰克图议约日记[A]. 吕一燃编.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173.
- [21] 陈策. 止室笔记第二种. 奉使库伦日记[A]. 卷一. 吕一燃编.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190-195.
- [22] 陈策. 止室笔记第二种. 奉使库伦日记[A]. 卷二. 吕一燃编.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217.
- [23] 外交大臣致驻蒙古外交代表密勒尔电[A]. 1916年3月1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441.
- [24] 关于“殖民地科学”的特征, 可参见梁波、陈凡. 试论“殖民地科学”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0(6). 35-36.
- [25] 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A]. 1912年9月21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62.
- [26] 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A]. 1912年10月7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75.
- [27] 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A]. 1913年6月19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158.
- [28] 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A]. 1914年3月20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月-1916年3月) [C].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1. 289.
- [29] 驻蒙古外交代表致外交大臣电[A]. 1914年3月31日. 陈春华译. 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1911年7

Scrabbled for the Wire Telegraph of Outer Mongolia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A Study of Technology and Imperialism

DONG Jie¹, GU Yong-jie²

(1.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010022, China ; 2.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AS, Beijing 100010)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and Russia scabbled for the Wire telegraph of Outer Mongolia to carry out a number of contentions. Because the two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in Outer Mongolia's political status, they had the different behaviors. China did the best one can, but when Russia threatened by dominion, China had to submission. Russia did the technical aggression by the wire telegraph in Outer Mongolia. It emerged the imperialis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tealthy, two-faced and compromise.

Keywords: Outer Mongolia, Wire telegraph, technical aggression, imperialism

收稿日期: 2009-07-3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晚清科学技术研究》(05JJD770018);

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蒙古近代科技文明研究》(CXJJB08001);

作者简介: 1、董杰(1982—), 男, 汉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蒙古科技史研究; 2、顾永杰(1974—), 男, 汉族, 河南省郑州市人。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河南博物院工程师, 主要从事技术史研究。